

中华经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,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,为繁荣当代文化、增强民族自信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。

日前,以“赓续诗词经典 传承华夏文明”为主题的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。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社、中华诗词学会、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。本版约请与会专家就诗词文化传承创新、文旅融合、诗乐共生、国际传播等撰文研讨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## 追寻语言和情感的原初

李敬泽

诗歌在中华文明的语言构造、情感生成过程中具有原初意义。以考古学的方法,追溯那些基本的情感和修辞的创生、演化过程,有助于更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《甲骨文合集》12870号,是“癸卯卜,今日雨。其自西来雨?其自东来雨?其自北来雨?其自南来雨?”这一段殷墟卜辞,我认为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首诗。区分诗和非诗,最基本的标准是语言。在这段卜辞里,语言在跳舞,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指事,其自身也获得了活力,获得了表情。这位最早的诗人,在问完了西来雨,还要问一下东来雨、北来雨、南来雨。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到节奏、灵动,甚至语言的天真游戏,开始有了后来《诗经》中那种重复的变化,有了一个人面对天地、面对生命和未来的那种期待、猜测、迷茫、欢愉。这位诗人发现了语言的音乐性,发现了语言的精神空间。

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不断发育的大脑,最早的皮层、最

早的神经元是在殷墟、在中原大地。《诗经》里那些最美的诗早已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,但对当初吟唱出这些诗的人来说,这是他非凡的创造,是从无中创造出有。汉语由此逐渐变得丰盛宽阔、五彩缤纷。

比如,《邶风·君子偕老》写到女性容貌、行步之美,“委委佗佗,如也如也”,“如山如河”的比喻道尽那时的人发现世间之大美时的惊叹和激越。《卫风·硕人》里,使用了一连串比喻,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,螓首娥眉”,诗人已经倾尽全力,把植物和昆虫都拿过来了,但显然比喻在这里并未传神,然后,诗人忽然说出了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灵光一闪,语言一下子亮了、活了,一下子把那种流动的、无以言喻的美捕捉住了、表达出来了。这样的诗句就是创造,丰富、扩展了我们的感受力和表现力。

张若虚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,“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”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,而是一个情感和诗学问题。按照情感考古

的方法,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《陈风》中的《月出》: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,劳心悄兮。”大地上,这个人第一次发现了月亮这么美,月光这么美,月光下行走的人这么美。他屏住呼吸,在心里造出“舒窈纠兮”这个句子,“舒”是慢,月光是流动的,像风中的衣带一样飘荡着,这就是“窈纠”,这样的词语启发着后来一代代中国人,从此月亮不仅是自然之物,还寄托着我们的审美和情感。类似的例子还有《郑风·风雨》,外在的、自然的风雨第一次与生命的、内心的复杂况味相互映照,从此开启了一种情感和表达的范式。

追寻诗歌中语言和情感的原初状态,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表达、如何书写,构成重要启示。那些伟大的原初诗人,他们的心向着世界敞开,他们创造新鲜如朝露的语言,开辟感受和表达的无尽原野。回到那些最初的伟大诗人,就是要成为语言的创造者,表达最真实、最丰富的世界和自己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)

## 推动中华诗词海外传播

张隆溪

中国的语言文化有一些独特之处,是我们习以为常而不自觉特别的。例如,从甲骨文、金文到现代文字,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使用至今的古老书写系统,今天的中国人只要稍学古文,便能阅读数千年前的先秦典籍。这种文字与文化的连续性,为古典诗词传承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石。自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以来,历代都有重要的诗人和广泛流传的经典作品,形式上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词、曲各有风格,格律对仗、音韵节奏与意象修辞自成体系,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原则,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,都构成了丰富的文学传统。

在诗学传统方面,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出发点。西方诗学的奠基之作——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,把诗看作是人对外在事物或客体的模仿,这一定义在西方文艺批评传统里影响深远。而中国诗学从《尚书·舜典》“诗言志”和《诗大序》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开始,就强调诗源于诗人内在情感的表达需要,形成了注重内在表现的诗学观念。当然,西方也有诗人如华兹华斯所言“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”,接近中国“诗言志”的观念;中国诗词更是不乏叙事咏物之作,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。在强调内在的情志之外,中国诗学也非常注重诗人的知识

和学养。西方批评传统也有类似的观念,认为既要模仿自然,也要模仿荷马。中西诗学传统固然不同,道理却可以相通,互相启发,共同构成世界诗学的基石。钱钟书先生说: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。”这应该是我们沟通不同文化,努力于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理解的一个基本原则。

世界文学是当前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的潮流,但在其中,西方经典仍占据主导地位,而中国诗词乃至整个中国文学,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这与近代欧美国力优势势直接相关。步入21世纪,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,欧美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,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为中国文学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。通过努力,我们完全有可能使中国文学的经典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,走向世界。

中国古典诗词历史悠久、内涵丰厚、魅力隽永,具备跻身世界文学主流的深厚底蕴。面对当前历史机遇,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以精准翻译、深度阐释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,用国际化表达呈现东方美学意境与文化内涵,激发海外读者的兴趣,推动中华诗词海外传播,让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李清照等成为全世界读者都熟知的名字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)

## 持续深耕诗乐融合

戴玉强

中华经典诗词之所以能穿越数千年依然动人,关键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。传承古典诗词,也要让这种深厚内涵与价值在当代找到新的表达。

诗乐融合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。当前,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呈现可喜态势,如何从艺术创作走向大众传播,仍是待解课题。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孙晓辉梳理百余首唐宋词乐乐谱,提出两条当代路径:一是在古谱基础上移调改编,二是立足诗词精神气质全新创作。成功的诗乐融合,一定是“师古”与“师心”的相融,既守住中华经典诗词的内涵与意境,也要用当代人听得懂、记得住、传得开的方式表达,让经典真正走进当代生活。

中原大地是中华诗词的重要发源地,这里诞生了《诗经》中的《溱洧》《子衿》等流传千古的诗歌,孕育了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等伟大诗人。这份丰厚遗产为诗乐融合提供土壤。近年来,我们持续深耕经典诗词的现代表达,打造大型情景乐舞音画《诗经今韵·溱洧风情》,演绎上古生活场景;创作交响组歌《唐风豫韵·诗乐河南》,为杜甫《登高》、刘禹锡《竹枝词》、李商隐《锦瑟》、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等经典名篇重新谱曲,实现古典诗意与现代音乐的深度交融。

以诗为魂、以乐为翼,守正创新、薪火相传。我们将持续探索诗乐融合新路径,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体系,让中华经典诗词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。

(作者为男高音歌唱家、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)

## 优质文化资源助力唐诗研究

李浩

正如自然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,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同样也不均衡。如果我们用地形来比喻优质文化资源群,河南及其毗邻的陕西等地可以称作一座山峰。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河南考古发现成果丰硕,与唐诗研究有关的碑志、壁画等资源,河南也是得天独厚。善用这些优质文化资源,无疑有助于提升唐诗研究水平。

陈寅恪强调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”,在地优质文化资源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引擎,其对唐诗研究的助

力主要体现在:一是辑补佚诗,丰富唐诗总集。陈尚君《唐五代诗全编》就是通过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、敦煌文献、瓷器题诗等,增补大量失传诗作,相较清编《全唐诗》增加了几千首之多。二是校勘文本,还原作品原生形态,揭示经典形成的复杂历程。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,敦煌本中题作《惜罇空》,同时还有“床头明镜悲白发”“天生吾徒有俊才”“古来贤圣皆死尽”等异文。此外,《蜀道难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等的敦煌本与通行本也多有出入。三是为唐诗的注解和阐释

提供直接材料。如新出土的唐代石碑《裴杰墓铭》为杜牧素有争议的《和裴杰秀才新樱桃》一诗的归属提供了新证据。四是诗、史与新出材料的往复互证,使唐诗研究从模糊走向高清。如唐宰相韩休夫妇墓发现的壁画《乐舞图》,为理解白居易《胡旋女》、元稹《胡旋女》等诗提供了直观的图像凭证。

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,社会大众对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华经典诗词热情高涨,这也鼓励我们充分利用在地优质文化资源,引导并提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热忱,做出新时代的精品学术成果,满足社会大众对高品质文化内容的迫切需求。

(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)

# 让诗词经典滋养当代生活



本版责编:胡妍妍  
版式设计:张芳曼

## 诗词与科学交相辉映

苏义脑

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说:“艺术越发展,就越需科学化,正如科学越发展,就越趋艺术化。艺术与科学于山麓分道,终在山顶重逢。”诗词,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,与现代科学可以彼此共鸣、相互启发。二者都源于人类的创造力,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。

从哲学维度观之,科学与诗词相辅相成、辩证统一。科学崇尚创新、精准、简约,创新和突破都需要想象力;诗词以浪漫想象、自由创造为特质,有助于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思维。想象力既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引擎,亦是诗词创作的核心养分。古往今来,科学与诗词融合不乏典范。北宋沈括兼具科学家与诗人身份,著《梦溪笔谈》、创“石油”之名,亦留诸多诗篇传世;达·芬奇、爱因斯坦、华罗庚等大家,皆在科学与艺术领域兼修并进,印证二者相融共通的内在逻辑。

工程科技人才要发展自己的感性 with 理性,以诗人之想象力谋创新,以科学家之严谨作论证,

一首好诗能够流传后世、深入人心,往往离不开凝练精警的句子。警句是作者情感、见识与品格的集中体现。刘禹锡被称作“诗豪”,正是因为他的诗作多有振聋发聩、鼓舞人心的警句,语言刚健、意气清朗。而这种风格的形成,与中原文化的长期浸润有关。

洛阳是刘禹锡的祖籍地,郑州是他的魂归之地。虽因战乱辗转江南,但刘禹锡始终以中原士子自居,中原文化刚健有为、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深深影响了他的入生态度与诗文追求。他一生多次遭遇贬谪,仕途坎坷,却始终不颓不坠,把人生阅历熔铸成掷地有声的诗句: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,写尽坚持的可贵;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于失意中见通达,于困顿中见生机。

中原士人重气节、有操守的传统,也在刘禹锡诗中得到鲜明体现。他不随世俗俯仰,不向困境妥协,“世道剧颓波,我心如砥柱”,正是这种立身准则的写照。面对自古流传的悲秋之叹,他独辟蹊径,写下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一反常态,昂扬向上,彰显独立不迁的人格

以工程师之能力去实现,以作家之文笔善表达,实现人文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协同提升。

王国维先生在其《人间词话》中用三首宋词说明自古以来成功治学的三个层次和境界,其一为晏殊之《蝶恋花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其二为柳永之《凤栖梧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其三为辛弃疾之《青玉案·元夕》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。我把它对应总结成三个字:学,研,悟。学诗作诗如此,科技研究同样如此。这三个境界顺序相承,学习是为了应用,要应用必须去研究,研究的结果是要达到领悟,掌握本质。科学研究的突破,尤其是方向创新和领域开拓,需要想象力,这正是诗词文化的特长。

我们应当以诗词文化滋养创新精神,以科学思维赋能文化传承,推动诗词与科研、生活深度融合,让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交相辉映。

(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)

与开阖磊落的胸襟。

刘禹锡的诗句尚雕琢、不求晦涩,以浅近之语写深远之思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以平常景物写尽世事变迁、盛衰之理;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,取自民间风调,清新自然,余味悠长。这种平易厚重的文风,也是中原文化审美品格的自然流露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的人生格局。同样是面对晚景与迟暮,李商隐慨叹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带着惋惜与无奈;而刘禹锡以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自勉,气势开阔,情绪昂扬,把暮年写得热烈而有光彩,尽显老而弥坚的精神力量。一悲一壮,一收一放,境界截然不同。

诗以警句而立,人以风骨而行。刘禹锡的警句,源于中原文化的滋养,成于人生磨砺的体悟,既立得住住诗,也立得住人。“芳林新叶催陈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”,坚守初心,才有千年文脉接续不断。

(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)

## 读懂黄河文明的精神底色

马银琴

《诗经》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,更是黄河文明精神底色的奠基之作。它以“颂”“大雅”“小雅”“国风”的结构,把周代立体化的礼乐制度凝固为传世的经典文本,其承载的古人对天人关系、家国秩序、政治德性、个体情感的思考,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与发展走向。

周代礼乐制度的建设,最初围绕雅颂乐展开。“颂”是娱神之乐,周人在对祖先的赞美与祈祷中,培养了注重现实政治的理性精神,强化了族群凝聚力。“雅”则与“王政”深度关联,在“言王政之所由废兴”的过程中,把宗法血缘与政治秩序熔铸一体。西周中晚期的“变雅”,对道义的坚守、对苍生的体恤、对责任的自觉,最终成为后世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精神的重要源头。至西周后期,邠乐首先打破仪式音乐局限于雅颂乐的限制,作为“迎寒”“避暑”“祈年”“祭蜡”等仪式活动的配乐进入国家典礼序列,由此开启了多姿多彩的国风音乐进入礼乐体系的先河。

“国风”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《郑风》。剥离后世道家学的偏见可以发现,《郑风》作品多为普通人真挚、鲜活的情感表达。它们既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的自然歌唱,也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的中和之声。这些作品和《诗经》中的其他作品一道,绘就了中华文明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的叙事与抒情传统,并因其“感天地,动鬼神”的力量,承担起“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”的社会功能,绘就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,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。

(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)

## 兼取情志 独成一家

刘青海

李商隐是继杜甫之后,在唐诗的抒情艺术上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。他的诗歌,因主情的特征和艳丽的风格,往往被归入六朝以来的“缘情”一类;但另一方面,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深度和广度,又明显继承了杜甫的精神,所谓“属辞之工,言志为最”。正因如此,历来对李商隐

诗歌本体观的判断都存在较大分歧。我认为,李商隐的诗歌是言志和强烈抒情性的统一。诗人早年关注晚唐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朝政腐败等,写下了一系列反映政治事件、讽喻社会现实的作品,表现出明显的言志倾向。后来随着诗人政治热情的消退,诗歌的艺术表现有所变化,多抒写不为世用的苦闷和悲哀。李商隐在抒情美学上有独特建树,“元气自然论”是其诗学观的重要基石。中唐柳宗元、

## 人间要好诗

陈才智

在闻一多称为“诗唐”的唐代,继李白、杜甫之后,白居易树立一座新的丰碑,开辟出诗歌史上具有“第三极”意义的新方向。他更加注重于大地人间,不仅兼纳李、杜之光,而且

开出融风流于日常、寓光辉于平凡的新路。与“气岸遥凌豪士前,风流肯落他人后”的李白不同,白居易与晚年杜甫的心境更为契合,更加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里,于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,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,正所谓“白傅风流造坦夷”。他放下官样体段,以平实的笔调、朴质的面貌、诗人的襟怀,描写着眼中的平凡世界。

白居易的名言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前一句指向现实,后一句关注民生,为诗歌创作兼顾时代和命运指明了正确方向。“天意君须会,人间要好诗”,这铿锵有力的诗句,出自白居易《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》,那一年他44岁,正在从长安至江州途中。白居易对李、杜十分尊崇,此前在《初授拾遗》中称赞杜甫“才名括天地”,在《李白墓》中赞叹李白“曾有惊天动地文”。此行赴江州贬所,多舟行江中,风雨飘摇之际,精神颓唐之时,心境落寞的诗人对于谪仙通客流落不偶之悲恨,自然感触更深。

一个人,应该怎样与时代相处?怎样与命运相处?如何自我实现?不妨读其诗,思其人,感其遇。从命运与时代的关联来看,白居易和李、杜一样,既生不逢时,又生逢其时;既引领时代,又超越时代。既然“文章憎命达”,我便“诗穷而后工”,在人生的宦海浮沉之后,以超然之志来淡然相对,将坎坷的命运融进广阔的时代,以诗性智慧化入丰富的人生阅历,最后熔铸为垂辉映千春的不朽诗篇,这就是白居易的时代和命运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)

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,刘禹锡、白居易等人有关“气”的文学思想,都给予他影响和启发。“元气自然论”所包含的尚真、任情的审美思想,造就了李商隐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的独特性,形成其诗歌整体上的“缘情”特征。“元气自然论”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明显,是对传统儒家以政教为基本功能的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,两者并不矛盾。

李商隐兼取儒道两家,形成其复杂而独特的个人面貌。我们要全面了解他的诗歌艺术,就要抓住李商隐诗歌思想的这一基本内涵。

(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、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)